

圆桌会议

的视野,使美学创新落到实处。

再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人学”关怀有个终极目标,叫作“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通俗的说法即“全人类解放”。不过后者多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涵义,指劳动者打碎了私有制的枷锁,从剥削和压迫下解脱出来,真正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而前者除了这层含义外,另具有一个精神世界得以自由解放的向度,亦便是人们常说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了。马克思本人在其《资本论》第3卷里将这两层含义界定得甚为分明,他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他还进一步申说道:“这个领域(按指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这段话语里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一种是“必然王国”里的“自由”,指人们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掌握规律以驾驭并改造对象世界的能动作用;另一种则是“自由王国”里的“自由”,意味着超越实际需求的范围以谋取人自身精神生活日趋丰富与发展的追求。在其未发表的手稿里,马克思更将这后一种“自由”的实现,归结为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使个人自由时间内得以充分享受艺术与科学教育活动。由此看来,审美(包括艺术活动)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当属于那种超越必然的心灵开发需求,跟实践活动中掌握必然以改造世界的规划并不处在同一层面之上;人也只有摆脱了自身紧迫的实用功利计较,方有可能悉心领会美的熏陶。这也便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发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这样的感慨,进而主张扬弃私有财产,转变那种“对物的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以达致一切属于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整体而言,马克思在“人的自由发展”的两重关系上的思考是十分深刻且辩证的,既看到了审美之类精神超越的需求不同于实用功利的需求,“个性的全面发展”应包含两种“自由”的相互协调与相互促进,同时承认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终当以人的现实的生存与实践活动为依托,而心灵世界的彻底解放更离不开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机制变革的大前提。西方美学史上长期争议不休的有关“审美”与“功利”关系的话题,以及当下中国美学界在

“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反复驳难,是否有可能从这一天才的提示中找到某种相互沟通与整合的渠道呢?

以上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确具有巨大的前瞻性和包容性,也正是这一无可置疑的前瞻性与包容性,促使马克思主义从革命、批判的思想武器转化为极富魅力的建设指针。用好这一指针,让它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建设广开道路,让它继续生气勃勃地从古今中外人们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中汲取养料以推陈出新,我们的事业才会大有希望,理论研究亦才能精益求精。那种拘执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辞,斤斤于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界限的做法,恰恰起到了封闭和禁锢马克思主义的不良作用,是理论建设工作中所当极力避忌的。

我们该如何发掘和继承马克思美学的批判性

□杨春时,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对马克思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的产物,因此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美学思想体系。最初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阐释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而形成的“唯物主义美学”(蔡仪为代表),它认为美是客观的物的自然属性,美感是对美的反映。这一阐释否定了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后来崛起的实践美学(李泽厚为代表),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对马克思美学进行了新的阐释,它认为美是客观的社会属性,是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一阐释肯定了审美的主体性、社会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成为主流学派。但无论是“唯物主义美学”还是“实践美学”,都是肯定的美学,如蔡仪认为美是物种的典型;而李泽厚认为美是人化自然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他们都认为审美具有现实性,审美是肯定性的。这些阐释都忽视了马克思美学思想的超越性、批判性,从而使之丧失了现代意义。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的分界,就在于古典美学以理性肯定现实,把审美当作理性的胜利,人性的实现;而现代美学则以审美超越理性,批判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发掘了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批判性,提出了“否定的美学”,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展开了审美批判。中国美学要实现现代发展,必须摆脱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古典阐释,进行现代阐释,发掘和继承马克思美学思想的超越性和批判性。

马克思美学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特别是在青年时期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



稿》,下文中所引文章如无说明均引自《手稿》中得到系统的建构,同时又在后期有所发展。马克思美学思想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多元的思想内涵,既有古典的、肯定性的美学思想,又有现代的、批判性的美学思想。因此,它为后来的阐释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其现代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先对马克思美学基本思想进行描述,从而揭示其发展和内在的矛盾。

马克思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而马克思哲学在实践论的基础上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确立了人的自由本质(逻辑规定)——异化(历史行程)——人的本质复归(共产主义或审美)的逻辑—历史叙述。马克思首先进行了逻辑的规定,就是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包括生产劳动以及精神活动在内。它既是人的自然的本质,又是人的社会本质。他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通过劳动实现的,是人的本质的确证。他说:“而生产生活也就是类的生活。这是创造生命的生活。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自我确证。”审美与劳动一样同属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是人的本质的确证。这一逻辑规定确定了审美就是人的本质——自由自觉性的实现。但是,它毕竟是一种逻辑规定,而不是现实的规定。因此,我们还要考察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论述。

马克思从逻辑进入到历史,于是发生了逻辑与历史的对立,从而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思想。他认为,由于私有制度,劳动由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出卖体力和智力的片面活动,丧失了人类活动的丰富性,它不能确证人的本质,反而使人与人对立、人与自然分离,进而使人的本质沦落。因此,在现实社会,劳动使人与自己的产品对立,人不能在对象世界“直观自身”,于是审美活动成为不可能。这就是说,劳动不能创造美,而成为非人的活动。马克思说,由于私有制以及劳动异化,造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于是劳动者丧失了审美的需求和能力。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对私有制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批判,并且否定了现实活动(包括实践劳动)与审美的一致性。

马克思在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让逻辑回归历史,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他认为,实践劳动虽然是异化的,但也为其本质的回归开辟了道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顶点,就将自我否定,废弃私有制,而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劳动异化将被克服,回归人的自由自觉本性,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也终将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在新的社会中,人的感觉获

得解放,审美成为普遍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他乐观地预言:“因此,私有财产的废除,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因此,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他认为,“不仅是五官的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都是属人的感觉,其中也包括审美的感觉。由于废除了“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才使包括“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由此可知,虽然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但这只是逻辑的设定,而不是历史的认定。他认为审美并不是劳动直接创造的,因为有史以来的劳动都是私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不具有自由自觉的性质;只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活动包括劳动才具有自由自觉的性质,才能创造美。当代实践美学的错误就在于直接把实践肯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认为劳动创造了美,而否定了实践劳动的异化性质,从而把自由的审美降格到实践活动的水平。

马克思美学思想具有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品格。它的古典性在于其肯定性。青年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肯定人的感性本质,并且把它建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虽然他不肯定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的现实,但毕竟认为劳动和审美可以在历史的最高阶段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于是现实活动与审美活动没有对立,人的本质可以得到实现,人与自然可以和谐,理性与感性可以得到统一,从而建立了一个社会的乌托邦。这一肯定性的美学思想带有古典哲学的印记,表达了一种启蒙主义的乐观精神。现代哲学打破了这种对人、理性、历史的乐观信念,揭示了现实生存的缺陷,这意味着即使历史在进步,但人永远不能克服与世界(社会、自然)的对立,不能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同一,不能把实践活动变成自由自觉的活动,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由,从而也不能与审美同一。现代社会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理论,结束了乌托邦的想象。于是现代哲学肯定存在的超越性,从而具有了鲜明的批判性。而现代美学也在这个哲学基础上强调了审美的超越性,对现实展开了审美批判。

马克思美学思想又具有现代性,蕴涵着现代哲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以人本主义理想否定了有史以来的一切社会存在,特别是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这是其美学思想的价值所在。马克思美学思想也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性。但这种批判精神为其他人本主义思想家所共有,并非马克思的独家创造。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批判性另有所在,这要从其哲学体系中寻找、发掘。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它不容于异化劳动,只是在消灭私有制的社会才得到实现,而审美是其中的一种。那么,如马克思所揭示,私有制下人与世界对立,审美的感

觉丧失,就不可能存在审美活动,只有在共产主义中才会有审美。但历史事实是自从有文明以来,就发生了审美活动,并且在文学艺术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马克思也论述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与审美的对立。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这就要诉诸审美的超越性。审美虽然发源于人的实践活动,但不等同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异化的,而审美是自由的。这就是说审美本源于存在,它具有超越性,即超越现实生存,包括超越物质生产实践,超越主客对立,超越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而达到了自由的领域。这一审美超越性思想,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合理推断,也是其必然发展。马克思美学思想也沿着这一逻辑线索发展着。首先,马克思改变了早期对实践劳动的浪漫主义肯定,不再认为只要消灭私有制就可以使人的一切活动都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不再认为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和实际生活领域创造出一个自由王国。他说: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资本论》第3卷)

在这里,成熟期的马克思修正了早期的思想:第一,实践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只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属于必然王国。第二,自由不再是实践劳动的直接造物,不能在现实世界实现,而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第三,包括审美的自由活动要在实践劳动之外才能实现,因此要缩短工作日。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理想,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消费的丰富,而在于工作日的缩短,剩余时间的增加,人们可以充分地从事包括审美、艺术活动在内的自由活动,从而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论述确认了现实与审美、必然与自由、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此岸与彼岸的分别将永远存在,只是社会的发展为精神的、审美的超越创造了更充分的条件,从而开辟了自由的可能,而不是建立一个地上天堂。此外,成熟期的马克思还把艺术生产规定为“自由的精神生产”,以区别于

意识形态等不自由的精神生产。这样,马克思美学思想就肯定了审美的自由性和超越性,从而更彻底地具有批判性。《手稿》中马克思对实践劳动与审美的敌对仅仅限制于私有制社会,而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审美与实践劳动之间的差距将得到消除。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他认为审美与劳动实践分属于彼岸与此岸两个不同的世界。审美不肯定现实,哪怕是理想的现实,而是以自由精神超越现实、批判现实,使人获得自觉性。这样,马克思美学以其批判性而具有了现代性,成为现代美学思想的发源地之一。

中国当代美学正在经历着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主要体现为超越理性主义,由肯定性向批判性的转变。这就是说,审美不再是理性(以及它制约下的感性)的显现,不再是现实生存的完善,不再是主体性的实现,而是超越理性和感性、批判现实生存、克服主客对立的自由生存方式。这一转变使中国美学与世界现代美学同步发展,并且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已经迈上了现代社会的门槛,现代性压抑加强,个体精神自由成为突出的问题,需要审美的批判和解脱,而古典美学对理性的信仰、对现实的肯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具有超越性和批判精神的现代美学才能适应这一历史时期人的精神需求。马克思美学思想无疑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思想资源,但目前主流马克思主义学派实践美学仅仅保留了其古典性,而排斥了其现代性。它肯定实践与审美的一致性,不能批判市场经济的异化现实;它肯定主体性和理性精神,阻碍了审美现代性的实现。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超越实践美学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古典阐释,从现代哲学的高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阐释马克思美学思想,发掘和继承其批判性精神,使其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建设的积极因素。

反思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流现象” ——重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关系

□夏锦乾,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兼职教授,《学术月刊》编审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部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也随之在中国落地生根。从那时起至今的百余年间,尽管传入到中国来的美学思潮、理论琳琅满目,但它们大多能落地却不能生根,能生根却不能发芽和结果。唯有马克思主义美学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中国土地上蓬蓬勃勃地生长,它毫无争议地成为以往百余年中国美学的主流。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中国美学的“主流现象”。

面对新世纪的中国美学,这一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主流现象”值得反思,这将涉及新世纪中国美学走向的

